



语言哲学研究

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下）

Researches o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editation on China's Post-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21st Century

王寅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语言哲学研究

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下）

Researches o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Meditation on China's Post-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21st Century

王寅 著
陈嘉映 钱冠连 黄斌 审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哲学研究:21 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 下/王寅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6

ISBN 978-7-301-24427-2

I. ①语… II. ①王… III. ①语言哲学—研究—中国—21 世纪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7693 号

书 名: 语言哲学研究——21 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下)

著作责任者: 王 寅 著

责任编辑: 刘文静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4427-2/H · 354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官方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24.25 印张 350 千字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序 一

王寅教授《语言哲学研究》的启示

钱冠连

一、启示 1:哲学与人共生共长

不会走路的婴儿,朝着大人用手指着周围的某个东西,开始了他或她的求生之路。两岁左右,他在大人的牵引下,一刻不闲着,努力将大人拉向他想要奔向的目标,并用手指向(refer to)那个目标(object, a thing),嘴巴里发出近似于“这个”(this one)、“那个”(that one)的词语。人开始了他的语言人生(所谓人生就是语言人生),他命中注定地要与世界(the world)的某些对象发生关系,他命中注定地就是一个哲学家坯子。年纪大了之后,他给他的儿或孙不断地现场教学,或问:“何物在此?(What is there?)”或问“这是什么?(What is this?)”“那是什么?(What is that?)”用手指,说词语,好意地强迫他的儿孙与这个世界的某些对象发生联系。用西方哲学的眼光,这上下两辈人就把毕因论(王寅译 ontology)或本体论的典型问题(What is there?)轻轻松松地、无意识地都规定好了!绝大多数人终生都不知道,他们的指称活动与指称性的提问与答问都写进了西方哲学书中!

生活中大多数时候,成年人与这个世界产生联系时,在奔向这个那个目标时,可以“心指”或“意向”,已经不屑于用身子奔、用嘴巴说、用手指。如果他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会了逻辑学,从欧几米德那里学到了几何学,他逐渐有了抽象的符号推理能力,他的思维可以超越直接的感觉经验,可以从事纯粹的思维操作。

看,哲学本来是和一个人共生共长的东西,不幸的是,它和那么多的人没有缘分,竟然分道扬镳。

二、启示 2:哲学与语言学共生共长

语言问题从来就是哲学视野中的重要话题。语言与哲学的血脉渊源,大

致上可用三个断言说清楚:“人在本质上是语言存在物”(亚里士多德),“语言是存在之居所”(海德格尔),“所有的理解都具有语言性”(伽达默尔)。在王寅此著作中,这是一条随时可见的、最醒目的主线。王寅说:“认知语言学与后现代哲学具有同生同长、相互关照、双方呼应的关系”,这是对后现代哲学与认知语言学之间关系的一个全新认识,具有普遍意义,对推动语言学家学习哲学,对语言学与哲学的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外语言学家都经受过哲学的早期训练。这样必然使他们的语言学研究原创性较多(没有只引进不创新之类的奇怪病象),理论深刻,方法论丰富,批判之风气正常而经常,既有不断的超越又有频繁的回归,没有跟风与抢热门的现象,带来了学术的持久繁荣。这样的因,结出这样的果,对中国语言学和其他人文学科是个很对症的启示。可是我们长期忽视了。

中国语言学的发展太特殊了。许慎、刘勰就不说了,晚清的那一批语言学家也不说了,我们的话题直接从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大学中文系与外语系说起。高中毕业生考虑报考中文或外语系的,多数人是数学不好、理科不怎样的学生。凭着大学四年的中文系与外语系的语言功底,在完全没有西方哲学训练(没有逻辑学、数学、符号学等等)的背景下就研究起语言学来。可能有人反驳说,现代汉语专业中不是也开逻辑课么?事实上,这一点点知识不可能代替专门的逻辑训练。而且,在逻辑学课程中,师生的兴趣不在其哲学渊源与哲学需要,只讲逻辑是思考的规律与需要,那么,这样对逻辑的理解,就有点隔靴搔痒了(见本著作中的数理逻辑部分)。有一部分人凭自己的好学精神自修了中国古代哲学,这是有眼光的,可是不学西方哲学,那基本上就难以与现代语言学沾边了。一句话,中国语言学家看家本领中的哲学意识基本空缺。

哲学意识基本空缺的语言研究者(包括本文作者在内),其语言研究之艰难可想而知。直到现在还有相当多的语言研究者认为学习哲学完全是多此一举,自找无趣。

现代语言学家可以不懂西方哲学吗?

徐烈炯^①说得好:“如果我们的兴趣在于哲学语义学,可以基本上不考虑语言学家的研究,但是如果我们的兴趣在于语言学中的语义学,则非得了解哲学家、逻辑学家的语义学研究不可,语言学家的工作很大程度上以哲学家的概念和框架为基础,为出发点。”(见该著作第六章第一节“概述”)

不知道分析哲学家(语言哲学家)如何从指称与意义着手而到意义的真

^① 徐烈炯,1990,《语义学》,北京:语文出版社。

值论继而奠定了语义学的基础^①,就无法知道语义学的概念与框架是怎么来的。

如果不知道语言哲学家如何从指称与意义着手从而发现“生活形式”与“语言游戏”论,直至发现“言有所为”与“言有所述”意义论,又到“会话含义”意义论,继而奠定了语用学的基础^②,就无法知道语用学的概念与框架是怎么来的。

研究母语习得的学者,不研究语言哲学大家 Quine^③: *Word and Object* 的第一章 Language and Truth, 就不知道哲学和语言学的研究为何要从日常指称事物开始,就不知道儿童是如何学会用词语指称事物的,当然就不知道母语学习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研究两语翻译理论的学者,不研究 Quine 的 *Word and Object* 的第二章 Translation and Meaning,就真的不知道翻译理解之不确定性究竟起源于何方,也不知道哲学家论翻译比翻译理论家论翻译,更为深刻而无不及。

语言学家“顺手牵羊”式地从此书中获得的东西定会大喜过望:指称的个体发生哪些非常细致的情形;为什么语言是一种精神的、文化的现象;一个语言共同体的语音常规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哪些情形下引起了指称的模糊性;为何与怎样使用数理逻辑(量化逻辑)式子(标准记法等等逻辑表达式),使用那些日常生活中人们几乎不使用的形式逻辑表达式究竟有什么好处(使不确定的意义得到精密规整),量化是什么意思(表达式中出现了变元以全称量词和存在量词来限定),量化又有什么功能;知道内涵逻辑与外延逻辑的争论对语言学家有什么好处,什么情形下内涵逃逸了,这些看似无用的东西对于科学理论的构建有什么必要;知道毕因论(本体论)抉择对语言学家有什么帮助;知道“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t)有什么好处(把人们对于对象的谈论变成了对词语的谈论^④,这样就非常方便地从谈论那些没有真实对象的困境中上溯到谈论词语的使用),等等。上面所述仅是语言学家对哲学必修之部分

① Alfred Tarski, 1944. "The Semantic Conception of Truth and the Foundations of Semantic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4.

② Ludwig Wittgenstein, 1958. extract from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lated by G. E. M. Anscombe (Oxford: Blackwell). J. L. Austin, 1962. "Performatives and Constatives" (chapter I) and "Conditions for Happy Performatives" (Chapter 11) 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H. P. Grice, 1989. "Meaning", in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③ Willard V. Quine, 1960.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④ 原句: A shift from talk of objects to talk of words, p. 271, 这便是影响众多哲学家的 Semantic Ascent(语义上行)论。

例子。

因此,拒绝语言哲学的中国现代语言学者们,总有一天,会发觉语言研究举步维艰,不绝如缕的局面。在读王寅此书的时候,不时地有一句话在我耳边响起来:拒绝哲学的语言研究像没有向导的盲人企图远行。

建议把语言哲学当成语言学学者与学生的必修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博士点就是这样办的),就会逐渐地从根本上改观我国语言学的困难局面。

现将王寅书中反复引用过的一段话以原文抄录如下,并作为本节的结束:Philosophy in its widest sense had been the cradle of linguistics^①。从广义上看,哲学从来就是语言学的摇篮。

三、堪称绕不开的基础教科书

本著作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有如下几点:

有时,先从语言学的须须摸到哲学的根根,再从哲学的根根滋润到语言学的须须。有时,直接从哲学的根根搜寻到语言学那里去,让语言学的读者悟出自己的摇篮原来是哲学家铺就的。这是第一。

第二,本著作把分析哲学(后来的标签为语言哲学^②)存在近百年的一段潮流(trend,或运动)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了。这可算西方哲学史的一个小线段。甚至可以说,作者从语言哲学上溯两千多年,又从其下接到了西哲第四转向后的后现代哲学潮流,把整个西方哲学的简史也摆出来了。这可算西方哲学史一条总线。能够弄清晰代史的人不少,写出通史或全史或总史的人不多,能够同时把一个线段和一条总线都梳理出来的人,更是不多。你可以发现梳理之中的种种疏漏,挑出种种问题,但扪心自问,我们得承认,作者所用之功夫,绝非一般人所能有;做出如此之重要贡献,绝非一般人所能叩问。

第三,作者善于用串联式图解来滤清思路,道出来龙去脉。从图1-1直到图20-1,总共绘制了85个图。在这些图中,如何分栏,如何提炼出极少的字词放进去以概括某一理论之精髓或概括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画箭头表示去向与承接,如何把最经典的口号与流行语(如“上帝死了”)浓缩进去,如何使用各种符号以分清层次,等等,一要有智慧,二要愿意花时间,三要用心血。这么多的东西,落实到读者那里却只有一个感叹:“啊,原来如此!”串联式图

① R. H. Robins, 1967.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London: Longman, p. 103.

② “In a broad sens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s nearly synonymous with analytic philosophy.”, See Nicholas Bunnin, Jiyuan Yu, 2001, *Dictiona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English-Chinese*. Beijing: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p. 755.

解把你心头许久的困惑一吹而散。这时,你不得不感谢作者思考百日才使读者云开雾散于一时的效果转换。

第四,作者几乎为每一个语言学理论在哲学的纵向的发展线条中找一个归属点。这必须有横扫(synchronical description)与竖梳(diachronical description)的功夫。横,共时线条上的一个点,即作者正在论及的一个对象(某问题或某理论)。那么,把这个点放进竖的历时链条中的哪一个位置上?找准了这个切入点,就把某一个问题的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与地位定下来了。

第五,将史论(对历史事实的客观论述)与“我论”(史论作者本人的论断)结合起来。写哲学史就是在做哲学,这是大家公认的。把“我论”写进史中去并不简单,本著作的作者在许多问题上都有自己的见解与发展,这就更不容易了。

第六,他对两千余年西方哲学人本观做出了诚恳批评(通观全书与参见第二十章第二节“不同哲学流派视野下的人本观”),他对语言哲学的梳理引发了对中国后语哲视野(第二十章)的期望、伸张与设想(建设)。写通史与断代史,批评与建设的理论勇气总是要有的。

综合上述几点,我认为这本书,堪称基础教科书,“基础”者,不是说它浅显,而是说它重要,绕不开,是必读教程。

我希望,没有受过哲学前期训练的中文研究者与外语研究者,赶快通读王寅的这本书,补上这一课。

我特别希望,没有受过哲学前期训练的要投考语言学博士与硕士的学者(无论是在外语院校读,还是在中文院校读),把王寅的这本书当成必读书,读过之后,估计你们就再也坐不住了,就会发现差距有读哲学的紧迫感了。

这本书,可省去语言哲学和语言学的初学者在茫茫大海中的许多苦苦摸索时间。

四、王寅之路

我以“王寅之路”,谓王寅将语言学与哲学打通的研究之路。其细节是:

第一,及早地具有自觉意识,全面地打通哲学与语言学,做个语言学研究的明白人。“我们必须从语言哲学的高度……跳出纯语言研究的束缚,不至于成为井底之蛙,终为糊涂人。”

第二,研究西土的东西不忘本土的资源。

第三,继承重要,不忘创造更重要。这方面的论述,贯穿全书始终。

另外,王寅,作为著名语言学家和语言哲学家,对中国后语言哲学的支持与参与,使事实上存在着的中国后语言哲学的溪流,形成了公开的潮流与趋势。(见即将出版的钱冠连《后语言哲学之路》导言)

五、本著作可能的久远影响

此书可能会在下面两个方面对后人产生久远的影响:

第一,他对两千余年西方哲学人本观的诚恳批评;

第二,他对语言哲学的梳理引发出来的对中国后语哲视野的期望、伸张与设想。

如果这个世界与人类不是酒阑花谢,我们总可看到与人共生共长的哲学归路。

Posterity will judge.

2012年4月14日于湖北仙桃

序 二

陈嘉映

王寅教授的《语言哲学研究》用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勾勒出了语言哲学的宏大景观。该著作不仅清晰梳理了西方哲学和语言哲学简史、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而且大力发展了钱冠连先生等提出的“中国后语哲”理论。纵览全书既能深切感受王寅教授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以及执着的探索精神,也能充分预见该书的出版必将在哲学和语言学领域形成新的发展动力。

该著作的难能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将整个庞杂的西方哲学史完整清晰地进行了梳理。从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开始娓娓道来一直到后现代哲学潮流,编制图表达 85 个之多,清晰地展现了两千多年的西方哲学发展史。足以可见王寅教授所投入的精力之巨大,绝非一般人所能及。

其次,创新始终与梳理同在。在该著作第一章将“感性 vs 理性”和“哲学三转向”结合起来;第六章基于波普尔(Popper)和阿佩尔(Apel)的三次转向以及后现代哲学思潮的兴起和发展,提出了哲学的第四转向,即“后现代转向”;第十四章从马列主义唯物论角度论述了体验哲学的理论基础。以上观点极具原创性,填补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空白;这些仅仅只是列举了一二,王寅教授在沉思过程中始终贯彻“梳理与创新”的方法,各章都遵循“既有传承、也有发展、更有创新”的思路。

再次,本书文字表达清晰,流畅。很多学者惯用艰深、隐晦的“哲学文体”以显示哲学的“高雅”与“深远”,这往往使得一些精妙的思想被晦涩的表达所掩盖,令不少读者望而生畏。本著作力求语句平白,表达衔接,层次分明,将艰深的问题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表述出来。其用语可用“精辟、精准、精简”来形容,使读者大有茅塞顿开、意犹未尽之感。

最后,深远的启示性令该著作锦上添花。王教授几乎分析了每一个语言学理论的哲学基础,明确指出要能对语言有更高层次的认识,对语言学做出更深刻的思考,对语言学理论有所贡献,(语言)哲学是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关口。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该书必定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国内语言学研究现状,促使越来越多的语言学研究超越纯语言研究的局限,深入语言哲学的源泉中充分吸取养分,见到一片更为宽阔的蓝天。

2013 年 8 月 8 日于北京

前言

(一)

国内已出了几本“语言哲学”方面的教材和专著,为什么还要再写这样一本题为《语言哲学研究——21 世纪的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的书?

目的主要有二:(1)清晰梳理西方哲学和语言哲学简史、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便于教学与研究,可使各种理论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晰易见;(2)中国学者当自强,经沉思后当有我国自己的理论,不必总是在为老外忙乎!积极响应中国学者提出的前沿观点,努力发展钱冠连等提出的“中国后语哲”理论。

学界认为,西方哲学主要经历了三次转向:古希腊的毕因论(即本体论或存在论)是在反思自然哲学的基础上形成的,着力研究 Being(毕因、存在)的实在性,努力追寻客观世界背后的绝对真理,建构形而上学知识体系,行走在研究“客主关系”的路径上。近代认知论发现上一目标难以实现,转向了 Being 的认识性,研究人们认识的能力、本质、范围、特征等,追问人们如何获得真知,从而形成了经验论和理性论两大阵营,坚守在论述“主客关系”的方向上。现代语言论认为形而上学的运思方向误导世人,不存在那些诸如“本质、绝对真理”等一类的命题(其中若干是伪命题),它们常起因于自然语言的模糊性,这才是引起误解和纷争的祸首,从而转向了 Being 的表达性;力主基于现代形式逻辑建构理想语言(又叫人工语言、形式语言),精确分析语言意义,将哲学重新定位于分析“语言与客主体的关系”上。

当我们回顾 20 世纪前半叶西方哲学时,似乎感觉到这样一个悖论:客体性与主体性的颠倒,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错位,形式主义与认知功能主义的对立。在此怪圈中,前者受到不该有的张扬,后者受到不该有的压抑,人的主体地位被冷落,个性和自由受到威胁,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严重分裂,使得社会科学陷入了前者所设下的形式主义怪圈。后现代哲学家(包括西方的体验哲学家和认知语言学家,以及中国后语言哲学家)深刻反思这一危机,严厉批判了(逻辑)实证主义,使得我们深刻认识到,科学主义和工具理性不是人文研究的根本出路,基于其上的形式语言学理论,虽自有其超越传统研究方法的过人之处,提出了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但也同样面临着自身难以

克服的若干弊端。

后现代哲学家高举继承与批判大旗,大唱反思与颠覆的高调,提出了一系列惊世骇俗的观点,真可谓:语不惊人誓不休。各种思潮不断涌现,可谓派别林立、繁杂多义,甚至互为对立,形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时代新画面,其显著特征为:反传统、超基础、去中心、非理性、后人道、多元化等。我们基于此提出了哲学的第四次转向“后现代主义”,它是对语言哲学的一次升华,大致经历了“人本性和批判性、破坏性和解构性、建设性和体验性”三个阶段。

有部分学者认为,西方语言哲学亦已渐趋式微,照此思路,当西方语哲这盏灯不亮之时,为何不点亮中国语哲这盏灯呢?我国著名学者陈嘉映先生(2005:191)曾在谈到为何不全盘接受西方思想体系,要加自己的东西时,将赵汀阳的观点总结为三点:

(1) 作为中国人想要做点特殊的贡献,是个自然的愿望;

(2) 丰富性本来就是思想的天然趋向;

(3) 现代世界的问题不是西方人的问题,而是大家的问题,需要大家献计献策来解决。

我想,语言哲学也应无国界之别,它虽源自西方,但也不应当仅是西方学者的专利,中国人同样可做出自己的贡献。当西方语言哲学处于渐趋式微之势(亦有争议)时,我们为何不能点亮中国之灯!笔者拟将钱冠连等提出的“中国后语言哲学(下文简称:中国后语哲)”置于全球人文研究的后现代思潮第三期之中,以进一步明确我们的研究方向。钱冠连等以(当代)语言为对象,大力倡导“节外生新枝”的创新精神,重新解读了语言家园中的奥秘,提出了一系列很有影响的崭新观点,如“语言全息论”、“语言是人类最后的家园”、“先秦名家语言哲学”、“明达思维语研究”、“语言三层次透明观”等。我们也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客观主义哲学理论,极力光大以人为本的原则,建构了“SOS 理解模型”、“体验人本观”、“意义体认观”、“命名转喻观”,为促发中国后语哲新局面做了些许尝试,并希冀能给全世界的语哲研究带来一丝光明。

对西方语哲和中国后语哲做如上一番“研究性沉思”,对当前的语言或语言哲学研究有何启发?我们认为,可进一步理清西方语哲要旨,尽快进入具有后现代特征的中国后语哲,确立继承与创新的理念,灵活运用“分析”之原则,不断开发有我国自己特色的科研创新之路,以期能为我国人文科研提供一种新的运思方案。为能将有关观点陈述清楚,本书拟努力实现以下三大方法:

(1) 图表梳理、论述系统。笔者将西方哲学史、语言哲学史、语言与哲学

交织史、隐喻研究简史、指称之争、人本纵观、认知过程等皆以图表的方法列出,然后以其为基本线索逐条论述,以能保证线条清晰、论述到位,且还具有“好学、便记、易查”的功效,争取做读书人“事半功倍”之良友。

(2) **学会方法、传承发展。**本书第四、五章重点论述了学习西语哲的七个方法,即分别从七个角度梳理其主要内容、历史渊源、具体成因、语言分析、意义定义、分析与综合之辩、指称之争等。在论述中始终贯穿“传承与创新”的理念,力争做到“既有学习,也有反思,更有发展”。

(3) **表达清晰、语句流畅。**很多学者惯用“哲学文体(艰深、隐晦、拗口、绕弯)”撰写哲学论著,以显示哲学的高雅与深远,常使得深邃的境界淹没在晦涩的文字中,吓走了一大批读者。雷柯夫和约翰逊(1980,1999)、陈嘉映(2003,2005,2007)、钱冠连(2002a, b, c;2005)、陈波(1998,2001,2005)、江怡(2009)、黄斌(1999)、韩林合(2007,2010)——等大力倡导用浅显语句表达思想,令人羡慕。我们亦以其为楷模,力求语句平白,表达衔接,层次分明。

(二)

语言学界的同行为何还要花时间和精力来学习西方语言哲学呢?

这是很多学者所关注的问题,我们学了那么多年的外语基本功,听、说、读、写、译等就实实在在地让我们忙得不轻,还读了那么多文学作品,看了一大堆语言学理论,做一名大学外语老师够用了。其实反思一下我们所学习的语言理论,不少内容亦已陈旧,寻根溯源不足,理论更新较慢,分析尚不透彻,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求。正如季国清先生(1999)20世纪末就指出:“语言学家对此(笔者注:指对索氏任意性从哲学高度的认识和批判)的反应尤其是对其深层次的哲学寓意还相当冷淡,这不能不说是件憾事。更大的遗憾来自于语言学对哲学成果的麻木和冷漠。”或许我们今天便可更好地认识到季先生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就拿“语义学”和“语用学”这两门人人熟知的学科来说吧,国内外语言学界很多著作和教材都未能深入语言哲学的源泉中充分吸取养分,论述很不到位,留下颇多遗憾,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甚多,这是“对哲学麻木和冷漠”造成的。

我们知道,语言分析自古有之,亚里士多德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语言分析建立了哲学和逻辑学理论,经过中世纪的发展语言分析活动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近代哲学也对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学界所说的“语言论转向(即语言哲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始于分析哲学,运用现代形式逻辑分析语言,努力将该说的的问题说清楚,建立了理想语言学派和日常语言学派,

且还包括欧陆人本哲学(参见图4-1)。正是由于这一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使得人们超越了传统的语言工具论,彻底颠倒了语言的客体地位,将其升华到主体、先验的哲学高度,为语言学界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基础理论和值得深思的崭新观点,我们不禁为之而精神振奋,备受鼓舞。如语言学中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大多搬用了哲学家的成果。可见,要能对语言有更高层次的认识,对语言研究做出更深刻的思考,对语言学理论有所贡献,(语言)哲学是一个永远绕不过去的关口。若将其称为“瓶颈”不一定每位学者都认可,但很多学者都深刻体会到,当通过这个“关隘”之后将会见到一片更为宽阔的蓝天,观察现象和分析问题的视角将会有别样感受。这就意味着,从哲学层面来思考语言必将会使分析更深入,见解更升华,运思更锐利,我想人们不会对此有多大分歧。这或许就是近年来国内不少院校为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开设西方语言哲学课程的原因,不言而喻,这一举措具有治本之功效。

站在世纪交替的十字路口,我们应当尽快打通语言学与(语言)哲学之间的通道,迅速解决两界相分离的“两张皮”问题,早日实现两界的合流,相互取长补短,这必将能成为本世纪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发展动力,有学者还主张将其视为“之首”,也不为过。难怪有远见的学者面对当今形势发出了如下呼喊:尽快超越纯语言研究的局限,迈向多元思索的新时代!这就是胡壮麟(2012)所说的“真理有时不在某一理论之‘内’,而是在不同理论之‘间’”,这一论断实在精辟!

是呀!我们为何不借用(语言)哲学界的研究成果来扩大我们的视野呢?为何不用(语言)哲学来武装我们自己的头脑呢?语言和哲学,本来就不可分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在漫长的历史中本来就是交织在一起的(详见第二章),罗宾斯(R. H. Robins 1967)所写的 *A Short History of Linguistics* (《语言学简史》)主要就是依据哲学理论来梳理和讲述语言学史的,若不了解哲学,何以能读好、读懂、读透这本语言学界必读之书呢?语言理论中有哲学观点,哲学流派中蕴涵着语言理论,在当今大力倡导跨学科研究的时代,我们更要与时俱进,静下心来认真读些这方面的著作,当会获得居高临下的感觉。

当然了,哲学著作一般颇费思索,难以理解,思想深邃,文字艰深,表达晦涩,盘旋在“抽象世界”,混迹于“概念游戏”,沉湎于“批判创新”,这也使很多学者望而却步,不愿涉足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维特根斯坦前期和后期的代表作,是以节号的方式编排的,各小节之间似有联系,但又很脱节。更使人恼火的是,不同学者对他的同一语句还有不同解读,莫衷一是,各持己见,以至于争论不休,难怪 Lugg(2000:1,144)说道:

Nearly everything about Wittgenstein's remarks in the *Investigations*

is controversial — how to read them, how they relate one to another, what they are meant to convey individually and collectively, and whether they are of enduring importance. (维氏在《哲学研究》中的几乎每句话都有争议——如何阅读它们,它们是如何互相关联的,它们在单用或合用状况下各传达了什么意义,以及它们是否具有持久性意义。)

But other readings are possible. (其他若干读法都是可能的。)

就连大哲学家罗素、弗雷格、费格尔等也常常误解,或根本就不理解维氏的思想,这才有了维氏对罗素写于《逻辑哲学论》的导言很不满意的事情。更有甚者,维氏在若干相关论述中还出现了前后不一致之处,人们不禁会问,维氏本人对这些深奥的哲学问题真的都想清楚了吗,为何会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解读。正如我国研究维氏的专家韩林合(2007:816,820,822)所说,

一个人欲真正完全正确地理解维特根斯坦在这本书中所表达的全部思想,这大概是不太可能的……

总而言之,理解这本书绝非易事。

误读同样会给某些读者带来快乐。

或许,后现代哲学思潮所倡导的“作者死了”的观点倒可很好地解释这一现象,既然作者在写完作品之后便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剩下的便是“读者反应论者”的广阔空间,“读者至上式的解读或新解(包括误解)”将不断更新文本的意义。同时,这类解释也在推动学术的进展,上文所引韩林合的最后一句话正可反映这一立场。

(三)

我国外语界的语言哲学研究基本状况如何?

笔者拟将我国近三十年来语哲研究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引进介绍,21世纪初期的消化吸收,近几年中国后语哲的节外生新枝。

20年前的昨天,外语界同行们认识到在英汉对比时尚需解决语言学与哲学的“两张皮”问题,很多学者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取得了不少喜人的成果,如许国璋(1988;1991)、钱冠连(1987;1989;1991;1995;1996;1999a,b;2000a,b;2001a,b,c;2002a,b,c;2003a,b,c;2005;2007a,b)在外语界首开西方语言哲学之中国先河,顺应了语言研究的潮流,踏紧了与时俱进的节奏,引领了学科发展的方向。在他们的指引下不乏后来者,王寅(1987a,b,c;1988a,b,c;1993;2001;2003a,b;2004;2005a,b,c,d;2006a,b;2007a,b,c,

d;2008a,b,c,d;2009b,c;2010)、黄斌(1999)、李洪儒(2001;2006a,b)、隋然(2003)、韩红(2005)、刘利民(2006;2007)、王爱华(2006;2007)、杜世洪(2010a,b;2011;2012)等积极响应,不断传来节外开新枝的好消息。钱冠连曾在2005年首都师大召开的首届中西语言哲学研讨会上说“需要十年就可看出今天奋斗的价值”,但是我们更为乐观,或许不需要这么久。

我国于2008年1月正式成立“中西语言哲学研究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年会(每届都有外国学者参加),会刊为《语言哲学研究》。从2005年起每年夏季举办“夏日语言哲学书院”,现已举办6期,参加人次过千。每届年会和夏哲院上都邀请哲学界名家做报告。国内很多外语类核心期刊或开辟语言哲学专栏,或不断择文发表,大力推动了我国的语哲研究。外语界学者还积极参加哲学界举办的各类会议,特别是2011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主办的“语言与价值国际哲学研讨会”竟有14名外语界老师参加,且有4人做了大会主题发言(详见第十六章第二节),掀开了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新篇章。

吉林大学著名哲学家孙利天在2011年暑期语言哲学书院上也喊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中国真地需要一场分析哲学运动。”我们衷心期盼中国相关学者能继续努力,奋发图强,为这场分析哲学运动的到来使劲出力,擂鼓助威!

体验哲学为我们提供了新视野,中国后语哲也在召唤我们向前迈步,认知语言学更为我们提供了新理论。必须尽快让自己的身心也进入前沿阵地,进入中国后语哲阵地,掌握“分析”的方法,不断拓展和更新自己的研究领域,实现与时俱进、持续发展之大略,完成我们这一代人应尽的使命。

言“只争朝夕”似有急功近利之嫌;说“畏难不前”似缺奋发努力之劲;道“离我较远”却是消极颓废之调,皆不可取。唯当记取罗宾斯(Robins 1967: 103)之名言“哲学是语言学的摇篮”,以身效仿钱冠连(2005:19)在此摇篮里打滚的做法,尽快投入到解决哲学与语言学两张皮(李洪儒 2006)的潮流之中,当会有效实现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增长点(王寅 2008a)。

(四)

“西方语哲”和“中国后语哲”之间有何紧密关系?体现了何种研究理念?

这两大主题正好可连贯地体现“传承与发展”的精神。就“传承”而言,就是要先静心坐下认真读书,特别是西方语言哲学的经典原著(参见附录1),部分章节应当精读,才可得其要领,获其精华,掌握方法,得道成“仙”。就“发